

# 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阙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功用

徐 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 西汉长安城的宫殿区和高官贵族宅邸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作为皇城的未央宫和市里百姓居住区是严格隔离的,而未央宫北阙,则是吏民上书、官员奏事、使节谒见的场所,是连接皇帝与官民,将民情、社会动向、公众舆论通达于上的一处信息沟通空间。这一功能,与北阙较为开放的地理位置有关。诣阙上书是下情上达的主要形式之一,北阙亦为汉王朝实施外交威慑的场所。西汉有数次吏民大规模集体诣阙活动,推想北阙阙前应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以容纳多达数万人。

**关键词:** 西汉; 长安城; 未央宫; 北阙; 诣阙

**中图分类号:** K87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2)04-0051-8

西汉帝国定都长安后,吏民、商人、儒生、游侠等往来其中。据估计,全城人口当在50万或以上,<sup>[1]</sup>举国的公共活动浓缩于长安,俞伟超先生认为“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是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sup>[2]</sup>

“汉代城市社会”的提法,尚有争论,不过从文献记载和汉赋的描述来看,两汉时期的确出现了一批相当繁华的名都大邑,聚集了大量人口。这其中,作为西汉最大城市的长安,自然成为我们把握帝国政治、经济、文化节律的窗口。对于西汉长安城的研究,历来不乏成果,无论是借助《三辅黄图》、《水经注》、《长安志》等传世地理类文献对长安城布局、建筑物进行的精细考索;还是1956年起考古学者对汉长安城遗址的实地考古勘察、发掘和研究,<sup>[3]</sup>都极大推动了我们在这座城市的认识。

本文拟从信息流通与传递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座各色人物云集的上古城市社会,关注在封闭的宫殿区、高官宅邸、坊里挤压下,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存在,以及公共空间所承载的信息传播与集散、上传与下达功能。正如宁欣先生指出的,通过什么方式传递和交流信息,传递信息的内容,主体和受众,传递后的反应和结果,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sup>[4]</sup>长

安城约36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中,未央宫北阙,作为皇城的未央宫与城内其它区域(包括城北宣平门附近百姓居住区)交接地带之一,既最接近皇帝所居,又是吏民乃至外来人口频繁活动的区域,自然成为长安城的一处下情上达空间。本文将首先对未央宫北阙的营建、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进行介绍,以明了其作为信息沟通渠道的原因。然后再探求在这一空间中帝王与吏民交流的方式与途径。

## 一 未央宫北阙的地理素描

立阙之制度古已有之,先秦文献中对“阙”之涵义、别名、型制多有介绍。阙的外观《太平御览》引崔豹《古今注》曰“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其上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示四方,苍龙白虎,元武朱雀并画其形。”<sup>[5]</sup>

秦始皇营咸阳、阿房二宫,都在宫门前立阙。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二月,《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至九年(前198年)完工。对于这句简单的叙述,诸注家作了详尽解释:

《集解》引《关中记》曰:“东有苍龙阙,

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索隐》：“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说文》云‘阙，门观也，高三十丈’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

《正义》引《括地志》云：“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颜师古云：“未央殿虽南乡，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於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指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是模仿秦宫旧制。关于北望咸阳而厌胜之术，当代学者大都持否定意见，如史念海先生认为“萧何是否以厌胜之术造未央宫，几经难于稽考”，指出未央宫以南是龙首原，“不可能再在宫南另建南阙，同样，未央宫之西就是西城墙，也不可能再建西阙，这样道理很简单，用不着以厌胜之术来解释”。<sup>[6]</sup>佐原康夫称厌胜为“一种苦涩的说明”，他说未央宫前殿南面，而在东、北立阙的构造“明显地是基于秦始皇咸阳扩张的构想”。<sup>[7]</sup>

颜师古注中又提出另一问题，关于未央宫的正门，他以为公车司马门只在北门，显然是错误的。《三辅黄图》载“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sup>[8]</sup>考古工作者也勘定了未央宫东、西、南、北四个司马门遗址的具体位置。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东阙、北阙各自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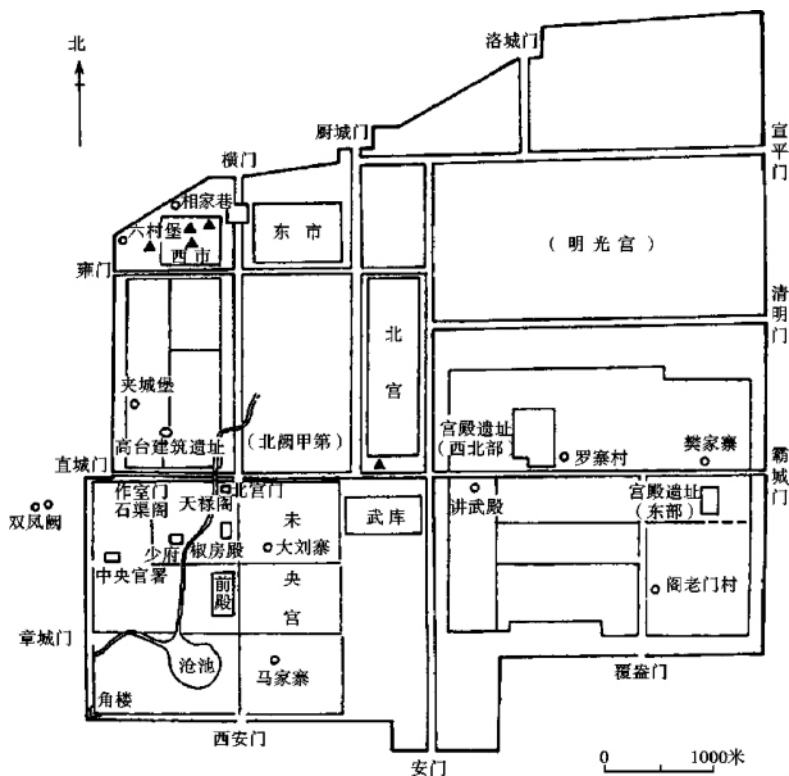
东阙在东司马门外，正对长乐宫西阙，皇帝一般由东司马门并东阙出，入长乐宫朝见太后，《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蹕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而诸侯王来朝也在东阙，《汉书》卷七十二上《五行志上》“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罍思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罍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昌邑王刘贺入京也停在东阙，阙外有驰道。而对于北阙，“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即士民上书则诣北阙。《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正义》“《百官表》云‘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汉仪注》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秩六百石。’”

可见东阙，多是帝王、皇室及诸侯王的活动场所，而民间与皇宫，吏民与天子，上与下的交流，则是通过北阙，以诣阙（上书或者面见）的形式进行。我们知道，未央宫是长安城最为核心的区域，选择在全城地势最高处，西南部毗邻高大城墙，东北部以诸宫、达官显贵宅邸，与市里百姓形成了空间隔离。而北阙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皇家提供的市里百姓向皇帝传达民情的窗口，甚至也是全国范围内吏民与皇帝交通的窗口，正门之争议，这里已经不重要了。

未央宫北司马门外的北阙之所以会成为上书、奏事、谒见、被征召的各色人等聚集之地，外国使节、各诸侯王使节也在这里请求朝见皇帝，当与其开放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刘庆柱、李毓芳两先生都认为，北司马门是未央宫经常使用的宫门，<sup>[9]</sup>考古学者对未央宫布局的勘查显示，北司马门遗址位于未央宫西北角以东1300米，天禄阁遗址东北60米处，北阙当在北司马门外。<sup>[10]</sup>北宫门以内，有一条宽10米的南北干道，南行通过皇帝日常办公起居的前殿东侧，至未央宫南宫门，向南延伸至长安城南侧西起第一门——西安门（图一）。这条道路是未央宫内南北向主干道，极为通畅，其中由北宫墙至前殿大约890米，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一名叫王褒的带剑男子就是从北司马门入，沿着这条道路很顺利地由东侧进入未央宫前殿的。<sup>[11]</sup>

未央宫北阙以外，北面正对长安城八街之一，长2830、宽约45米的横门大街，<sup>[12]</sup>至横门大街北部，东市、西市分列左右，再至横门，直通渭桥，北望咸阳原上的汉帝陵寝。刘庆柱以为这条从西安门至横门的南北大街，正是长安城的中轴线。<sup>[13]</sup>

汉长安城中的百姓，以及朝廷大行动北出，多在横门外“祖道”，帝王拜谒渭北皇室陵区和前往甘泉宫，必经横门。外来人口进入长安城，由横门入横门大街也是较多选择的路径，考古勘探结果表明，这条道路使用时间很长，来往人员很多，因此路土堆积较厚。杨宽先生指出，安门大街虽也是南北长街，但大部分经过宫殿区，不是人们出城进城的主要通道，“人们从外地要进入未央宫，多数还是从宣平门或横城门入城，经横门大街南下进未央宫北阙……”<sup>[14]</sup>王仲殊先生也认为“西北面的横门和东北面的宣平门就成了



图一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局部)

长安城中吏民出入最频繁的城门”，<sup>[15]</sup> 以上所述，或许是皇帝将吏民上书地点定在未央宫北阙的主要原因。另外，从图一可清晰地看到，北阙经横门大街直对东西二市，市场也是人口聚集且流动频繁的地方，长安城“前朝后市”，朝在未央宫，北阙正介于朝市之间。北阙以北，还有东西向道路直城门大街，西通长安城西出南起第二门——直城门。新近对直城门的发掘表明，门宽 32 米左右，进深 20 米，共有北、中、南 3 个门道，而皇帝专用的东西驰道恰通过此门中道。直城门是长安城向西的主要出口，张骞出使西域可能就是从这里出发。<sup>[16]</sup> 直城门离未央宫不远，故文献中有将“北阙”与“直城门”连称的情况，如《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雨雹，杀牛羊。”师古曰：“北阙直城门瓦皆飞也，直城门，长安城门名也。”

未央宫北阙当长安城宫城内外的交通枢纽，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其附近区域，也是一处政治性极为浓厚的空间，如“北阙甲第”。长安城中达官显贵的住宅，也在北阙附近。汉高祖十年诏“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初学记》卷二

四《宅第》对此解释“由甲乙次第，故曰第，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sup>[17]</sup>可见“第”是开门直临大道的，今天的勘测结果，北阙以北，桂宫以东的横门大街东边可能就是“北第”所在，<sup>[18]</sup>住在这里，临近皇帝所居未央宫，便于与上交流，一般都是皇帝及其亲信的大臣。《汉书》卷四一《夏侯婴传》言高祖“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颜师古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故张衡《西京赋》云‘北阙甲第，当直道启’。”夏侯婴因为曾经救过惠帝和鲁元公主，得到了极为尊贵的待遇。而汉哀帝时，董贤颇受宠幸，哀帝“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

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第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又见于王嘉叙述“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汉书》卷八六《王嘉传》）。可见董贤所受恩荣。

由于官员的迁转，居住在北阙附近的仕宦家庭，可能是经常轮换的，但是他们显赫的仪仗，北阙宅邸的盛大气派，不仅成为城中的一道风景，也作为一种美好的历史记忆，在后世人的吟咏中，成为长安城的代表性物象。

## 二 下情上达的渠道：诣阙

在未央宫北阙前，最常发生的是诣阙活动，包括书面与面见两种交流渠道。两汉诣阙上书不受身份限制，如得到采用，甚至可拜官封侯，故出现了“天下布衣各励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书》卷六七《梅福传》）的局面。这里从拜官和获罪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考量诣阙活动。

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诗句，<sup>[19]</sup>充分展示了下情上达过程中事态的戏剧

多变。在汉代未尝不是如此。吏民与帝王沟通而瞬息导向的生死、福祸、拜官获罪，无不浓缩在未央宫北阙这处空间。

《汉书》卷五一《枚乘传》记载其子枚皋在梁国获罪，“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已经沦落为亡命之徒的枚皋，在北阙上书自明身份，“以故得媒默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

祸福荣衰的剧变，促使一些平民进行政治投机，如《汉书》卷七一《雋不疑传》载，民男子成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其诣阙是为得“富贵”，于是出现了元始五年（5年）未央宫阙下惊心动魄的场面——“有一男子乘黄犍车，建黄旛，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此次事件由个人诣阙活动演变成公众事件，说明未央宫北阙确是城中有较大公众效应的空间。个人或集体带有投机性的诣阙活动，往往是长安城中民众情绪、社会动向的晴雨表。男子冒充卫太子一事竟然引得“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右将军勒兵阙下”、数万吏民聚观，正说明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太子冤死事件历昭、宣、元、成、哀诸帝，仍然持续性地影响着西汉高层政治和民情。

与之相类似，汉宣帝时长安亭长张章，因失官“之北阙上书，寄宿霍氏第舍，卧马枥闲，夜闻养马奴相与语，言诸霍氏子孙欲谋反状，因上书告反”。张章虽在偶然的时间、地点得知秘事，但霍氏一族专横的行为恐怕在长安城中也积累了相当的怨愤，故而他的政治投机马上收到了效果，“为侯，封三千户”，由此而飞黄腾达。《易林》中有这样的占卜辞句“恒，乘龙从蜺，征诣北阙，乃见宣室，拜守东城，镇慰黎元，举家蒙福”，<sup>[20]</sup>可见诣北阙从而通向荣华富贵，已在时人心中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印象。

“长安城斩人大都在东市或北阙之外”。<sup>[21]</sup>北阙外何以成为行刑的场所呢？如果诣阙上书不得皇帝之心意，则随时有可能获罪，乃至被斩杀。如杨恽在诣阙上书获罪后，回忆自家昔日的繁盛

和获罪原因，“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汉书》卷六六《杨恽传》）。而《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有“章交公车，人满北军”句，如淳注引《汉仪注》曰“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北阙，公车所在。”西汉有专门收治诣阙上书获罪者的上书者狱，在离北阙不远的北军营垒狱内监禁，由北军尉审判。<sup>[22]</sup>可见当时上书获罪者绝不在少数，亦可能暂时被囚禁在北阙。

如严重触怒皇帝，可能会直接被杀于阙下，如《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叙述燕王刘旦在“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的敏感时机，“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sup>[23]</sup>更多情况下，是官员因上书被下狱，为保持名节，在阙下自杀，如盖宽饶奏封事劝说汉武帝让位于贤人，执金吾以为他“大逆不道”，“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诣阙上书内容多关涉机密或意义重大，如告变等，一旦不慎泄露，为被告人所知，上书人的人身安全往往受到威胁，可见到被告者从阙下杀上书人的事例，《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载大侠郭解至关中，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作“季主家上书又杀阙下”，颜师古注“于阙下杀上书人。”

### 三 头悬北阙：汉王朝的外交威慑

未央宫北阙由于其独特的政治意义，是帝王与外界交流的第一渠道。前文着重强调其在“通下情”于普通民众中的枢纽作用。而作为强势的中央帝国，汉王朝的皇帝同样需要把握外国的信息，并向其传达旨意。在（国）内与（域）外的外交交涉中，北阙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略敷衍如下：

西汉时代与四夷，尤其是西域诸国的外交活动中，常会见到头悬北阙的场面，而又以汉武帝征伐四夷的时代尤为多见。流传后世的“请缨”故事的人物原型终军，曾对汉武帝说“愿受长

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这里还只言及将蛮夷首领本人羈至阙下，而在与匈奴的外交交涉中，直接出现了“头悬北阙”的威慑性辞令。《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亲自巡边至朔方，列兵十八万，同时遣使者郭吉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郭吉以南越王头悬北阙的事例警告匈奴，不要与汉作对而应向汉称臣，激怒了单于，不过“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同事见于《汉书》卷六《武帝纪》，结果叙述为“匈奴警焉”，可见还是收到了效果。

汉武帝时代，这样将蛮夷首领头悬北阙，还见于大宛国。《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武帝册封李广利的诏书中言“贰师将军广利征讨厥罪，伐胜大宛。……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同时还有异域珍奇之物献于阙下。《汉书》卷五四《苏建传》记载苏武义正辞严地警告劝其投降的义律“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可见汉王朝的外交人员已经自觉运用“头悬北阙”的威慑意义，来展开工作，防止四夷变乱。

汉昭帝时，楼兰王安归从属匈奴，杀汉使者，平乐监傅介子接受大将军霍光的命令，刺杀楼兰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皇帝下诏褒扬“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从。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

对于这里的“北阙”的地点，发生过一些争议，林梅村先生认为这里的北阙，是罗布泊地区的 LE 古城的北城城门，“两千年前汉将傅介子侧沙楼兰王安归的历史事实就发生在 LE 古城之内，安归的头颅曾被悬挂在此城北城门上示众”，<sup>[24]</sup>这是值得商榷的，前引《汉书·傅介子

传》言“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而《汉书》卷七《昭帝纪》述此事“介子遂斩王尝归首，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是将楼兰王首通过驰传传回长安，然后才有公卿大臣的议论与皇帝的褒奖。李吟屏先生指出挂楼兰王首的北阙，只能是长安城未央宫北阙，是宫门而不是城门。<sup>[25]</sup>事实虽已明晰，但为何一定要将蛮夷首领的头颅千里传送回长安，在未央宫北阙上悬挂？长安城虽然是政治中心，但城中居民以汉人为多，本来的威慑对象，应当是不肯臣服之四夷，林梅村先生以为楼兰王首悬于楼兰国都城城楼，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何处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对于大宛王和郅支单于头悬北阙事件的不同记载：

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县藁街，乌孙所知也(《汉书》卷七〇《段会宗传》)。

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屠蚩尤于东郡，挂郅支于北阙(《北齐书》卷五四《文苑传·颜之推》)。

这里出现了藁街、蛮夷邸两地名，且“头悬北阙”同时又表述为“头悬藁街”，上引《陈汤传》颜师古注“县，古悬字也。蛮夷邸，若今鸿胪客馆也。崔浩以为藁当为藁，藁街即铜驼街也。此说失之。铜驼街在洛阳，西京无也。”

藁街是长安城内八街之一，其具体位置，宋程大昌《雍录》卷八“藁街”条“藁街，武帝斩南越王，傅介子斩楼兰王，皆悬其首北阙。北阙，未央北门也。陈汤斩郅支单于，上疏乞悬之藁街、蛮夷邸间。诸家无言藁街之在何地者。”<sup>[26]</sup>考古学家有不同推测，或认为是直城门大街，<sup>[27]</sup>或认为蛮夷邸在横门大街，<sup>[28]</sup>或认为“藁街可能是直城门或横门大街。藁街有蛮夷邸，蛮夷邸在北阙附近。”<sup>[29]</sup>

近来有学者详细讨论了汉代的蛮夷邸，蛮夷邸在藁街上，即汉长安城中接待四夷往来宾客的旅舍，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朝也住在这里，从而将藁街比定位横门大街。认为由于未央宫北阙正对横门大街，离蛮夷邸不远，故悬首北阙能对往来长安的四夷宾客起到警戒作用，史籍中将北

阙与藁街混用,其说可从。<sup>[30]</sup>总之,北阙成为西汉王朝施展外交手段的重要场地,“宜县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明确地点出了“头悬北阙”的特殊用意。

#### 四 下情上达空间的若干问题

##### (一) 阙前空间大小蠡测

本文第一部分依据考古学成果描述了未央宫北阙所处的地理位置,但由于北阙遗址不存,我们无法得知其详细形制,所占据的空间大小,不过现存建章宫东门外双凤阙,二阙遗址之间距为53米。未央宫东宫门外有与阙址有关的二夯土基址,间距为150米,<sup>[31]</sup>前述横门大街宽45米,这三组数据,可以作为北阙阙址间距的参考。诸记载汉长安城的地理类书中,唯《陕西通志》绘制了立体的北阙及阙前空间。<sup>[32]</sup>

图中的北阙是一个大门楼,而由所标示的北司马门向外至北阙,再至北阙外的另一座楼式建筑,中间的间隔似乎都不太大。不知其作图的依据何在。从北阙承载上下交通的功能来看,要容纳上书言事的城中官员、吏民、诸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涌入长安的诣阙者,阙前应当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大广场。本文第二部分在考察诣阙事件时,只讲到了个人诣阙行为,而描述集体诣阙行为的几条史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阙前空间的大小。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讲到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张邯行城门,逢兵见杀。王邑、王林、王巡、萑恽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汉兵贪莽封力战者七百余人。会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王邑等人利用北阙距击汉兵,且与七百余人作战于阙下,可见阙前空间较为广阔。《汉书》卷七二《鲍宣传》描述了西汉长安城中的太学生运动,太学生们不满对于司隶校尉鲍宣的处置,“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选择北阙作为公共集会场合,共同向皇帝情愿,值得注意的是参加集会的诸生竟达千余人。而《王莽传上》讲到,王莽在是否以其女为皇后问题上作政治表演,伪装谦让,引得“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

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这个数字也是千余人。

另有两则材料,《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中京兆尹赵广汉坐贼杀不辜下廷尉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如果以《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所载长安城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计算,全城至少1/24的人口竟能聚集在北阙前,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条材料即前述民男子假冒戾太子诣阙,引起长安城举城上下恐慌的政治事件,“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

除了围观的吏民数万人,还有二千石以上官员,以及相当数量的兵员,一时间都集中于阙下,王子今先生认为“城市中公众行为动辄多达‘数万众’、‘数万人’的记载,也可以为我们推算当时长安的户口数字时提供某种参考。”<sup>[33]</sup>而本文关注的,是容纳这数万人,要多大空间。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极为粗浅的推算,因为长、宽、高三维数据计算存在一定难度,我们暂且只考虑阙前空场的面积问题:

表一 中国18~25岁青年体质调查  
测量数据的平均值(部分)

项目 性别	男	女
肩宽	38.6厘米	35厘米
足长	24.8厘米	22.9厘米

注:本表从邵象清编著《人体测量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所附“中国18~25岁青年体质调查测量数据的平均值”表格中截取。

从表一可看出,1985年前后,我国全国范围内青年男性平均肩宽0.386、足长0.248米,青年女性平均肩宽0.35、足长0.229米,北方地区数值较此略高。如许文生先生1938年《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显示,华北平原汉族男性平均肩宽为 $371.1 \pm 0.6$ 、胸深 $211.2 \pm 0.4$ 、足长 $253.8 \pm 0.3$ 毫米。<sup>[34]</sup>这里以男性为准,一个以立正姿势站立的男性(双脚间距离=肩宽)所占据的地面面积,可以用肩宽×足长来计算。为方便,参考上述数值,男性取肩宽0.40、足长取0.25米,则站立的男子大约占据地面 $0.40 \times 0.25 = 0.1$ 米<sup>2</sup>的面积,而如果25000人同时站

立,忽略人与人之间的间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至少需要2500米<sup>2</sup>的地面面积。前面提到,北阙北临直城门大街和横门大街南端,横门大街大约宽45米,直城门大街宽度在45~56米左右,<sup>[35]</sup>暂都以50米计算,则两街交汇处大约有2500米<sup>2</sup>的面积。北阙以北即阙前的空间正好是两街交汇处,这样看来,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话,数万吏民在阙前只能摩肩接踵了。

## (二)“入非常室”:空间的侵扰

前引《汉书·王莽传上》吏民请立王莽女为皇后的材料“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显示宫门与“廷中”、“省中”非同一概念,宋程大昌《雍录》卷二“公车司马门”条说“自司马门内则为禁中,孝元之后父名‘禁’,避讳改‘禁中’为‘省中’。‘禁’者,有所禁止也;‘省’者,察也。汉制,官于禁中者皆有二尺竹籍,记人之年名字物色,垂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初元之制,凡从官给事宫司马门中者,得为亲属通籍,非通籍,不得入。则夫禁中之门,立籍以行。”<sup>[36]</sup>认为未央宫司马门以内为禁中。而杨鸿年先生依据两汉书资料推测,由宫门到省门,有一定的距离,中间甚至隔有殿宇,进一步提出“汉代掖庭即后宫,亦即所谓省中”。<sup>[37]</sup>对此,有学者作了补正,认为皇帝、太后日常所居及皇宫内殿,都属于静态之禁省。<sup>[38]</sup>

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未央宫北阙这一下情上达空间以外,作为皇宫的未央宫和宫外的达官显贵宅邸、市场、市里百姓居住区是隔离的,皇帝、群臣、百姓,各有各的生存空间,作为禁中的帝王生存空间,具有不容侵犯的权威,除了禁省宿卫官员外,余人不得随意出入,官员亲属进入也要通籍,官员进入禁省,不能佩戴刀剑,而“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受窦皇后宠爱的小儿子梁王曾和太子“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汉书》卷一〇二《张释之传》)。问题的严重性,竟至于皇帝亲自向太后免冠谢罪。而这种制度在曹魏时期仍然较为严格,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裴注“《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

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对于司马门和禁中的侵扰,或许是魏武帝对儿子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如此严明的内外空间之别,竟在有时被极为轻易地打破。当然,多是通过未央宫北阙这一交通最为活跃的地带。

《汉书》卷二七下《五行志下》载“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招前殿署长业等曰‘天帝令我居此。’业等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状,下狱死。”这段材料前文有所提及,王褒正是沿着由北司马门经前殿东侧至南宫门的道路,直深入890米左右,且佩戴刀剑,至“非常室”,如入无人之境,对于这种奇异现象,史书认为是不祥之兆,作了如下解释“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见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径上前殿路寝,入室取组而佩之,称天帝命,然时人莫察。后莽就国,天之冤之,哀帝征莽还京师。明年,帝崩,莽复为大司马,因是而篡国。”

另一例侵入禁中的例子,也见于《汉书·五行志下》,“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厖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小女子陈持弓由横城门入城,沿横门大街南下,进入未央宫之尚方掖门(北掖门),直至禁中,“殿门门卫户者莫见”,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其他原因,史书中又把这种空间的侵扰行为归为外戚秉政,王莽篡国的预兆,“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小女而入宫殿中者,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戾孤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时,帝母王太后弟凤始为上将,秉国政,天知其后将威天下而入宫室,故象先见也。其后,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权,至莽卒篡天下,盖陈氏之后云。京房《易传》曰‘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

这两条材料,是很值得玩味的。

总之,在西汉王朝长达210年的统治时期,未央宫北阙始终是一块有特定功能的区域,皇帝可以从这里了解全国范围内真实的民情,在官僚



机构行政奏报之外,获得更多的社会信息;吏民从这里谒见或上书,通达上意,甚至有机会面见圣颜;四夷使节从这里探明汉王朝的外交态度。集体、个人、官员、百姓,从这里参与、融入到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活中去,开启生死、祸福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西汉长安城中肯定还有许多类似的公共空间,等待着考古学者、城市史、政治史、社会史学者去发掘和探索。

#### 注释:

[1] 西汉长安城居民户口数量,对于《汉书·地理志》上提供的“户八万八千,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的数据,有学者认为偏低,如杨宽、刘云勇等认为当在50万以上(杨宽《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90~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刘运勇《西汉长安》,第95页,中华书局,1982年)。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对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的高度估计相当普遍,如何兹全先生认为汉代城市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参见彭卫《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第1~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因而有学者提出了“汉代城市社会”的判断,并有专题研究,见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4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 1950、60年代主要考察长安城遗址范围,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1970年代主要是发掘武库和长乐宫宫殿遗址;1980年代后期进一步勘察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的结构和布局,究明了东市、西市的位置和基本形制,确定了高庙遗址的地望;1990年代以来,勘察了汉长安城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范围。参见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24~14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最近的考古发掘是2008年5~10月考古工作者在直城门的发掘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4] 宁欣《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功能:以唐长安为中心》,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的研究》,第2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太平御览》卷一七九《居处部七》,第872~873页,中华书局,1960年。

[6] 史念海《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谨以此文恭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大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7] [日]佐原康夫著,张宏彦译《汉长安城再考》,《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8] 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卷二,第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9] a.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62~172页; b.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4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 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文

博》1995年第3期。

[11]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59页。男子带剑进入未央宫事,见《汉书》卷二七下《五行志下》。

[12]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19页。

[13]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形制初论》,《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77~185页。

[14]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08页。

[15]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9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图版拾壹~拾伍。

[17]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第578~579页,中华书局,1962年。

[18]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第166页。

[19] (唐)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全唐诗》卷三四四,第4105页,中华书局,1999年。

[20] (汉)焦延寿撰《焦氏易林》,第89页,中华书局,1985年。

[21]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21页。

[22] 关于上书者狱的论述参见宋杰《西汉的中都官狱》,《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23] 此条材料虽未交待系何处阙下,同事亦见于《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的叙述“卫太子废后,未复立太子。而燕王旦上书,愿归国入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而巫蛊之祸时武帝居城外建章宫,事后归未央宫,这里当指未央宫北阙。

[24] 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文物》1995年第6期。

[25] 李吟屏《悬挂楼兰王首之北阙考》,《文物》1995年第12期。

[26] (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八“藁街”条,第161页,中华书局,2002年。

[27] 李遇春《汉长安城城门论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

[28]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第169页。

[29]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21页。

[30] 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31] 李遇春《汉长安城建章宫东阙及宫阙研究》,《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第7版。

[32] 刘于义等监修《陕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1~556册。

[33] 王子今《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34] 邵象清编著《人体测量手册》,第410~412页。

[35] 考古学家推测直城门和霸城门之间原来可能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而现在处于东段的长乐宫内,东与霸城门相连,西与直城门大街相连的道路路面宽达50余米,这样看来,直城门大街宽度也当在50米左右。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19、22~23页。

[36] (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第29~30页,中华书局,2002年。

[37]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3页。

[38] 谢彦明《汉代禁省宿卫制度试探》,《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赵宠亮)